

CHINA

明清之际 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

沈定平 著



MINGQING ZHIJI ZHONGXI WENHUA JIAOLIU SHI



商务印书馆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调适与会通

沈定平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调适与会通/沈定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ISBN 7-100-03301-2

I. 明… II. 沈…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明代 IV. 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9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调适与会通
沈定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01-2/K·699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7/8

定价: 35.00 元

序 言

一般来说,文化的进化或发展,大都采取两种形式。一个独立文化系统纵向的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表现出文化传统内敛的连续性,这是一种形式。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展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与兼容性,这是另一种形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这后一种形式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愈益显得重要。明清之际,即 16 至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便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它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那个时代,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逐渐突破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的状态,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而日益具有世界性的反映。大致看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两种文化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表现之一,它肇始于 16 世纪中叶,而影响所及直至法国大革命,持续达两个多世纪。表现之二,交流的媒介即来华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是作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而同中国文人学士进行广泛的交往。表现之三,从欧洲所动员的传教士的数量(有两三千人之众)、国籍(来自东西欧十余个国家)及其在中国活动的地域(不仅包括京城内地,也涵盖边疆地区)来看,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性。表现之四,交流的深入程度,已经从最初欧洲人对中国物质文明的倾慕,进入到思想和精神领域如何调适与融合这两种不

同的文化,最后提升到政治文化制度的层面相互吸收与仿效。整个交流过程循序渐进,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是两大文化体系间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交往是在西欧国家向世界进行军事征服和精神征服的背景下展开的。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决定放弃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流行的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强盛的状况分不开的。因为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欧洲要略胜一筹。这样强盛的国力,使明清王朝能成功地挫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同时,也使来华的耶稣会士一再宣称,他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利玛窦语)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创造了条件。凡此说明,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

正是在此基础上,交流的各方都把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作为须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既是在华耶稣会士制订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国士大夫和康熙皇帝的眼中,又是维系他们同传教士友好交往的重要条件。但从受到中国思想启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这个原则便是他们呼吁加强交流从而达到互补互利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始终是跟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若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

这个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同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就中国而言,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进行,而经济的发展却同政治腐败及各种社会矛

盾的激化形成很大的反差。于是,在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中,为了强化已被腐蚀的传统价值,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学术基础。剔除腐败,振兴道德,纠正浮躁,树立崇尚经世致用学风,给衰落的传统科学注入复兴的生机和活力。当此适应社会变革的“实学”思潮蔚为壮观之际,“西学”的传播正是适逢其会。通过“至西学始为实学”的变化交融,西学有可能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

与中国相仿佛,欧洲亦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掠夺农村强制发展商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弊窦丛生、陷入困境之中。于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向往一种“开明专制主义”,实行发展农业的重农主义政策,希望利用君主专制制度作为改革的工具。然而,在欧洲历史上却找不到鼓吹这种“开明专制主义”的楷模和依据。特别是为了打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蛹体,从中抽取出新的世俗的社会形态,启蒙思想家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督教会,企图以一种崇尚理性和道德的“自然神教”来取代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而这同样需要有令人信服的范例。正如欧洲“近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全靠深入异邦文化的精神”一样,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Leibniz),曾热情地讴歌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称“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象。这样一来,便给今天的人们提出了研究的课题,即如何梳理这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揭示蕴涵其中的发展规律,并从中引出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这个课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即是明证。

鉴于过去有关的系统性著作尚不多见,故作者不揣谫陋,善自

砥砺,决意撰写《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部分的开篇,为历史的回顾,缕述15世纪前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远比欧洲先进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从中可窥见处于强势的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以便为尔后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提出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明代部分的内容,是沿着两条历史线索展开的。一条是来华耶稣会士在对国情有所认识的前提下,逐渐抛弃在当时基督教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将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传教路线。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至利玛窦集其大成,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的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了。书中特辟出较多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利玛窦在建立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整体构架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该构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另一条历史线索,则是明中叶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呼唤下,思想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在这总称为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李贽等早期启蒙思想的流传,还有东林学派的崇尚传统价值和道德节操,及明末蓬勃兴起的科学思潮。凡此种种都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给某些士大夫的西学倾向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最终为西学融入实学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实学与西学交融中,明末的知识阶层出现了西学的热潮。其中,涌现出一些同传教士关系密切、深慕笃信其教义的士大夫。他们代表了明末西学热潮中那种寻求一个新的学术基础,借以强化已经腐败的传统价值的趋向,并且将这种社会趋向直接跟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学联系起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

本书最后一章,通过对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大致评述,可以看

到,两条原本是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的历史线索,在徐光启和利玛窦这两位代表性人物,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和会通中,出现了彼此重叠与融合的局面。特别是他们共同培育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思想基础,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起了奠基和示范的作用。

后续的清代部分,将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拟分为三大序列。第一序列,继续对原有的历史线索进行考察。既关注传教士内部坚持和反对利玛窦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分歧与斗争,又揭示杨光先等人掀起“教难”的实质及其危害性,这预示中西文化交流多舛的命运。此外,还详细阐述热心于文化交流的康熙皇帝,由于坚持“利玛窦规矩”,使西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诸如新历法的修订和确立,皇舆全览图的勘绘,尼布楚条约的交涉,圆明园的建筑,以及西洋图画、医药、对数和技巧的引进,西学的传播至此达到鼎盛,亦由此发生蜕变。最后,综述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发展。由于欧洲教廷的横加干涉和妄自决断,禁行中国礼仪并宣布解散耶稣会。而雍正、乾隆皇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实行严厉禁教,致使持续达两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中绝。

第二序列,辟出专门的章节,结合所谓“李约瑟难题”,即十六七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的问题,来总结明清之际西学的传播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积极影响及其表现,同时探讨它被遏制、蜕变乃至中断的社会因素及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第三序列,以相当的篇幅,阐扬中国思想文化西传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探究中国文化西传的途径和形式,适应性传教路线与西方汉学起源的关系,以及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的种种表现。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揭示西欧启蒙运动与中国古代思想的

联系,即:来自东方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料的重要源泉。在中国已经衰熄的中西文化交流,其丰硕的果实却依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散发着芬芳,并一直持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是如此丰富,作者虽殚精竭虑,努力探赜索隐,但所得亦不过是一孔之见。本书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鉴之、正之。倘若人们能从拙著中引发一些对明清社会形态及其近代化进程的思考、探求和研究,那对于我来说,将是莫大的鼓舞和欣慰。

作者 于北京三元桥

霞光里

2001年3月30日深夜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	1
第一节 汉代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及其影响	2
第二节 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和衰落	11
第三节 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盛及衰败的原因	18
第四节 四大发明的西传及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36
第五节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 历史性贡献	43
第二章 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	67
第一节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和最初的中西交往	67
第二节 殖民势力与教会的紧密结合及基督教 在东方的传播	84
第三节 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思潮	102
第四节 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	122
第五节 中西文化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 交往的新时期	135
第三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酝酿和策划	156
第一节 沙勿略: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者	157

第二节	范礼安: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组织与策划者	181
第四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早期实践活动	218
第一节	罗明坚进入肇庆	218
第二节	罗明坚传教策略的失误及返回欧洲	249
第三节	罗明坚的科学与宗教著作	265
第五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进一步发展	288
第一节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集大成者利玛窦 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289
第二节	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	312
第三节	利玛窦开辟南昌与南京新传教区	341
第六章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 理论总结	371
第一节	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 西方科学技术	372
第二节	利玛窦在北京出版的中文著作	405
第三节	利玛窦对传教策略的最后调整 and 理论总结	436
第四节	利玛窦晚年的心态及死后的荣耀	457
第七章	适应性路线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 的分歧及其影响	487
第一节	中国传教团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 分歧与斗争	488
第二节	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	510

第八章	明末的统治危机、社会思潮和 西学传播的文化氛围	525
第一节	明中叶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危机	527
第二节	王学、泰州学派与西学	542
第三节	东林学派与西学	557
第四节	科学思潮与西学	575
第九章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 及其代表人物	611
第一节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	612
第二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瞿汝夔	631
第三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冯应京	654
第四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杨廷筠与李之藻	673
第十章	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义与 儒家思想的调适	708
	历史人名索引	739

第一章 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

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在这里,我们拟介绍15世纪之前,当中国的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的一般情况。我们将看到,最初的丝绸贸易对于提高欧洲人的生活品味和文明程度,推动欧洲城市经济的复兴与发展,以及开辟东西方交通要道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更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纸和印刷术的传播,乃是知识与教育从政治、宗教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强有力工具。火药和火炮的轰鸣,敲响了欧洲封建军事贵族的丧钟。四大发明尤其是指南针的应用,成为打破欧洲中世纪的闭塞状态,促进近代世界观形成并引导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至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则成为直接诱发世界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因素,同时在摆脱欧洲传统的地域限制,扩展欧洲人的精神视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总之,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早期阶段,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痕迹,看到它为欧洲社会变革所创造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欧洲文化与中国交流,主要表现于基督教在唐、元两朝的传播。由于该教过于依赖封建政权,且传教局限于少数族群之中,加之传教士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节操,故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微,更勿论在社会变革中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两相比较,在15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

文明不仅处于积极、主动和优势的地位,而且对欧洲的物质文明与社会变革,都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回顾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况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与欧洲这两个相隔遥远且有不同风格和背景的文化体系之间的交往,并非短暂的、突发的和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一个漫长的、具有内在联系并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交流形式(如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四大发明的科学技术传播,景教、也里可温教的流传,柏朗嘉宾和波罗父子官方、半官方使节的交聘等),及其代表人物(如马可·波罗等)的作用和贡献,自然不应忽视。然而,还须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如明清之前与明清之际)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其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例如,通过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朝廷凸显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引发明清之际激烈的“礼仪之争”的滥觞。又如,唐、元两朝基督教失败的原因,显然给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以深刻的教训。在总结已往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成功地将其前辈的弱点转换为自身的优势,从而得以在中国社会立足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再如,中西文化交流从马可·波罗的阶段到利玛窦的时代,从最初对中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倾慕,到在思想精神领域对中西文化进行调适和融合,这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不断积累的过程及其内在的联系。凡此都是我们在阅读本章内容时,所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节 汉代中国与欧洲的丝绸 贸易及其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国家。秦始皇时,便有商人如乌氏倮,收购国内精美的纺织品,私自运销于境外,获

利十倍,并以此而富比封君。^①至西汉,全国织丝者数以百万计,随着产量的递增,不同种类的丝织品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用品。正是中国丝织品上佳的质地和丰富的产量,使丝绸贸易成为最早联系东西方的一条重要的经济纽带。

汉武帝时,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汉朝军队已深入到帕米尔分水岭以西,同西亚建立了正常的交往。与此同时,外交礼聘十分活跃。而与这种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活动相适应的,便是同西方丝绸贸易的兴盛。依据张骞的报告,西域不出产蚕丝,于是丝绸便成为中国出使者携带的主要礼品。如张骞出使乌孙,并分遣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诸国时,“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②可见使臣赍赠丝绸数量的巨大。因此,随着西域的开拓,中外使节交聘的频繁,“一般中国丝绸,在大宛、大夏或安息都被视为珍贵物品加以接受了,而作为回赠,中国朝廷则收到这些国家的稀奇物品。这样,交换使节就成为一种贸易形式,而且由于创造了习惯和需求,还为进一步非官方的贸易开辟了道路”。这样一来,“公元1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已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始了。当罗马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给予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刺激,产生了一个贪恋各种异国奢侈品的豪富的统治阶级时,这种爱好便进入欧洲。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丝绸在意大利成了常见的商品”。^③

历史上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可分为陆路和海运两条途径。从陆路来看,“出(甘肃)玉门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③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第38—40页,中华书局,1995年,北京。

旁南山(昆仑山)北麓至沙车,西逾葱岭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指罗马帝国)。汉的大批货物主要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另一条是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①

另一条则是海路。以罗马所属埃及的红海诸港口为基地,直接从海上开拓驶往印度乃至整个亚洲南部的海岸线。先是水手们利用西南季风发现了从红海前往印度西海岸主要商业中心的航线,公元1世纪末,罗马商船又再次利用季风横越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而接近于交趾(今越南)的东京。这样,除了陆路之外,中国丝绸还由来自红海的罗马船舶分头运输。但因为进口的丝绸大部分还得运到叙利亚加工,而货物运到叙利亚并远达塞流西亚(底格里斯河上)的自然路线,便是从陆路走完全程。不过,这种海路运输并未维持多久,至3世纪便处于衰退的状态。

一般来说,无论陆路或海上的丝绸贸易,大体上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罗马与中国之间陆路的丝绸贸易几乎一直是间接的”,“即居中为媒介者,如吐火罗人、大夏人、安息人、米太人……亦不知最后享受者为何人;惟有底尔或其他地中海海口之腓尼基水手,方知罗马为其主要市场。故此漫长之交通线,实分数段同时并进也。”^② 第二,虽然丝绸贸易操纵于中间商之手,但由于开辟

①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第3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北京。

②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第55页,中华书局,1995年,北京;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87年,长沙。